

研究生教学用书

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

政治学方法论

The Methodology of Political Science

张 铭 严 强 主编

苏州大学出版社

研究生教学用书

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

政治学方法论

The Methodology of Political Science

张 铭 严 强 主编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学方法论 = The Methodology of Political Science/张铭,严强主编.—2版.—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9

研究生教学用书 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
ISBN 7-81090-138-9

I. 政… II. ①张…②严… III. 政治学-研究方法-研究生-教材 IV. D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60715 号

政治学方法论

张 铭 严 强 主编

责任编辑 许周鹤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苏州市干将东路 200 号 邮编:215021)

丹阳市兴华印刷厂印装

(地址:丹阳市胡桥镇 邮编:212313)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6.25 字数 340 千

2003 年 9 月第 2 版 2003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81090-138-9/D·11(课) 定价:25.00 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0512-67258802

前 言

政治学方法论对政治学研究来说,极其重要。它既是一种工具,又是研究工作展开的一个基础,更涉及政治学的重大“元理论”问题。因而,政治学方法论上的重大变动和发展始终是政治学研究不断深入的一种恒久的动力。

然而,在政治学方法论的教学和研究过程中,我们深切地感到,这门学科在某种程度上尚未很好地反映出我们时代在认识论方法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展。绝大多数现有的政治学方法论教材和著作受科学主义和行为主义方法影响的束缚,把政治学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政治科学”领域,把政治学研究方法框定在实证研究和经验研究方法的小天地中。这样的一种倾向尽管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发挥过相当积极的作用,把政治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但也正是这种倾向,使人们几乎忽略了对政治大系统形成、发展与变迁过程中参与者主体的建构作用、能动作用这些重大要素的研究,从而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视野。正是由于这种局限的存在,当政治学研究在微观领域取得足以自豪的成就时,突然发现自己不仅在面对重大时代挑战、面对必要的价值权衡时,竟是那样的软弱无力,而且也同时失去了自己原先所具有的魅力,难以成功地吸引充满探求欲望的学子。

当然,如果我们真的进入了一个如有些人所谓的“历史业已终结”、“意识形态业已终结”的时代,如果现实的政治在整体上真的已臻完满,不再需要,也不再有可能面对重大的价值性挑战,没有必要去努力探索和寻求那些可能的替代性方案的话,那么,政治学研究方法论的这种局限也许并不是一个缺点。然而问题是,我们真的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我们真的有可能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之中吗?

正是带着这样一些疑问,我们觉得,政治学研究的范围不能只局限于

经验科学的范围,而政治学研究的方法也至少要包含实证研究方法和规范研究方法两大块。不仅如此,我们还感到,政治学研究中的实证研究方法和规范研究方法不只是对立的两种方法。在确立起新的、建立在主客体互动耦合基础上的客观性原则后,原来在人们眼中唯一“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在我们看来实际上不过是规范研究方法在一种有限范围内的应用。这样,政治学研究中原先对立的两种方法便获得了一种新的统一,而政治学方法论研究在这个意义上,也就获得了一种新视野。本书正是在这样一个认识前提下的一个探索性成果。

尽管如此,摆在大家面前的这本书也只是提供了一个可供讨论的基础。由于时间仓促,很多细节性的问题尚未深入,整个新的框架也没有在每一章节中都得到真正的贯穿,全书的有机整体性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所有这些,既有待于我们不断地去努力,也望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本书是诸多学者精诚合作的成果。最初的写作提纲经张铭和严强认真讨论,由张铭执笔拟定。初稿写成后,分别由张铭和严强负责进行修改。最后,全书由张铭统稿和定稿。本书的具体写作分工如下:

第一编,张 铭(第一、二、三章);第二编,严 强、孔繁斌、魏 姝、周向红(第四、五、六章);第三编,侯焕春(第十章)、乔湘流(第七章)、卞海霞(第八、十二章)、王国平(第九、十一章);第四编,严 强、孔繁斌、魏 姝、周向红(第十三、十四、十五章)。

编者谨识

2000年1月

目 录

前 言	(1)
-----------	-----

第一编 政治学方法论一般

第一章 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与政治学方法论一般	(3)
第一节 政治学的研究范围	(3)
第二节 政治学方法论一般	(7)
第二章 政治学研究中的价值和事实	(14)
第一节 政治学研究与“价值中立”	(14)
第二节 政治学的实证研究	(20)
第三节 政治学规范研究的复兴	(24)
第三章 政治学实证研究方法和规范研究方法的统一	(28)
第一节 两种研究方法统一的障碍:实证的客观性原则	(28)
第二节 两种研究方法统一的新基础:主客体互动中的客观性原则	(31)
第三节 实证研究方法和规范研究方法在统一前提下的分殊	(34)
第四节 政治学研究方法及其客观性检验	(37)

第二编 政治学研究的基本范畴

第四章 概念与定理	(43)
第一节 政治科学中概念的建构	(43)

第二节 政治科学中的定理	(52)
第五章 理论与范式	(63)
第一节 政治学元理论的建构	(63)
第二节 政治理论构成要素分析	(66)
第三节 政治理论范式及其转换	(69)
第六章 解释与预测	(81)
第一节 描述性研究	(81)
第二节 解释的方法	(85)
第三节 预测	(95)

第三编 政治学研究中的分析框架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分析框架	(99)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分析政治的根本方法	(99)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分析政治的基本角度	(106)
第八章 政治学的行为分析与心理分析框架	(121)
第一节 政治学行为主义分析方法的形成与发展	(121)
第二节 政治学行为分析方法的特点与评价	(127)
第三节 政治心理分析方法	(131)
第九章 系统论和结构功能分析框架	(135)
第一节 系统分析框架	(135)
第二节 政治学的结构功能分析框架	(146)
第十章 政治学的权力分析框架	(154)
第一节 政治学权力分析方法的产生与发展	(154)
第二节 权力分析方法的特点与评价	(157)
第十一章 政治学角色分析框架	(166)
第一节 角色分析框架	(166)
第二节 集团分析方法	(173)
第三节 精英分析方法	(177)
第十二章 政治学的沟通论与决策论分析框架	(182)
第一节 政治学的沟通论分析框架	(182)
第二节 政治学的决策论分析框架	(188)

第四编 政治学研究课题的设计与完成

第十三章 政治学研究课题的规划	(197)
第一节 政治学研究课题分析	(197)
第二节 政治学课题研究类型的选择	(200)
第三节 政治学课题的研究方法设计	(206)
第十四章 政治学课题研究的资料搜集	(212)
第一节 问卷法	(212)
第二节 访谈法	(215)
第三节 测验法	(219)
第四节 观察法	(222)
第五节 实验法	(224)
第六节 文献法	(227)
第十五章 政治学课题研究的资料分析	(231)
第一节 单变量统计描述	(232)
第二节 双变量统计分析	(235)
第三节 多元分析	(238)
第四节 关系网络分析	(242)
第五节 研究报告的写作	(245)
主要参考书目	(248)

第 一 编

政治学方法论一般

第一章 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与 政治学方法论一般

作为研究政治学的工具和手段的政治学方法论,是每个政治学学者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应用的对象,它大体上回答着“如何展开政治学研究”这样一个问题。对于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又必然涉及到“政治学研究范围的确定”这一问题,因而对政治学研究范围的讨论总是构成政治学方法论的一个前提。有关政治学研究范围问题的讨论,主要的争论在于它应不应该局限于“政治科学”的范围。从政治学研究的历史发展来看,把政治学研究的范围限定在“政治科学”内的做法,是受科学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影响的结果。在科学研究应做到“纯客观”的神话已破裂的今天,“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都必然地进入了政治学研究的范围中。由此我们看到,政治学方法论在自身的总体构成、选择运用以及自身证明等方面必然会告别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行为主义阶段。

第一节 政治学的研究范围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政治学研究方法是研究政治学的工具和手段,它大体上能回答人们关于“如何研究政治学”这样的问题。而每一个政治学的研究者不管自觉还是不自觉,都会在自己的研究中运用这种或那种研究方法,都在实际上回答着“如何研究政治学”这样一个问题。自觉地对政治学研究方法本身进行研究和探讨,实际上也就深入到了政治学方法论范畴。在这个意义上,凡是涉及“如何”研究政治学这一命题的所有理论探讨似乎都可以包括在政治学方法论的视野之内。

然而,在我们具体展开对“如何”研究政治学这个问题的探讨前,还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什么是政治学?或者换个角度说,什么是政治学研究的范围?因为对于这个特定问题的回答,实际上直接影响到政治学研究方法和手段的确认和规定。我们只有在首先确定了政治

学的范围之后,才能回答“如何研究政治学”这样的问题。不难理解,政治学研究范围的确定,很自然地构成了政治学方法的一个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前提。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了解到,讨论政治学方法论问题为什么总是要从“什么是政治学”,以及“政治学的研究范围”这些方面入手。

政治学是一门极其古老的学问。人们至少可以从留存下来的最早的文字记录中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先人是如何对政治现象进行观察、分析以及作出他们自己的解释的。在一般意义上,我们常常把历史上以及当今的学者、思想家们所作的有意义的政治分析称之为政治思想或政治理论。如果我们把这些学者、思想家们对政治现象所作的思考都列入政治学范畴中,那么这些政治思想家的思想活动特征便大体上可以分成这样两大类:一类是具有工具性、“科学性”特点的分析活动;另一类是带有相当价值色彩特点的分析活动。

工具性、“科学性”的分析活动一般是指那种能够得出在经验上可检验、可确证结论的研究活动。这种研究活动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能够回答“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而对于“应该怎样”的问题,它基本上尽可能地加以回避。由于这种方法几乎把对政治的研究活动限定在“经验”的范围内,强调自然科学方法中的严谨性和可证伪性,因此也被称为政治学研究中的“实证方法”。一般来说,这种方法在对政治现象的研究过程中,包括在观察、描述与分析中强调做到“价值中立”、“价值祛除”和“客观公正”。由于这一类分析活动近似于自然科学分析方法,故而人们常常把对政治的这种分析活动冠以“政治科学”的称号。

价值性分析活动则与工具性、“科学性”分析活动不一样,它关注的重点不是去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而是致力于回答“应该怎样”这一带有规范性的问题。在它看来,政治学乃是一门要对历史上、现实中和理想里的各种政治体制、政治设计作出自己价值判断的学科。由于这样的特点,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政治学在研究方法上不能过分强调“价值中立”,实际上也无法做到真正的“价值中立”。由于这样一种分析活动和自然科学分析方法差距很大,人们为了将它和“政治科学”相区分,便以“政治哲学”相称。

“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这两类有很大不同的分析活动虽然能从概念定义上加以明确区分,但是对大多数政治学研究者来说,这两者常常会在研究中交叉在一起,兼而有之,界限往往并不是非常清晰的。比如就政治学研究的开山大师亚里士多德来说,他在对希腊城邦政治的研究中就

具有这样一种特点。他一方面花了大量力气对一百五十多个城邦的政制进行了观照、描述和比较,表现出对于“是什么”的浓厚兴趣,并在自己这方面的具体分析中张扬了一种“实证”精神;但在另一方面,他又再三强调,他对城邦制度的研究是为了探究一种“善”和一种“值得过”的政治生活。在他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构成了他整个研究围绕旋转的一个核心,并最终就这个问题得出了自己极为明确的结论。毫无疑问,亚里士多德这方面的研究活动再也清楚不过地带上了价值分析的色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我们能够看到,“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综合在一起,发挥着不同的功能。

“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在政治学研究者那里的交叉综合运用尽管相当普遍,但对于具体的政治学研究者或具体的时代来说,这种交叉运用也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的“半斤八两”,相对平衡。某些研究者或某个具体的时代会对某一种分析活动特别感兴趣,会很鲜明地表现出自己研究活动的方法偏好性来。就思想家柏拉图、卢梭等人来说,他们的研究活动使他们厕身于政治哲学家的行列:前者致力于自己理想国家的描述、分析和探讨,并把一个由“哲学王”领导、具有高度等级分工的社会视为“最高的善”;而后者则在近代法国社会出现结构性转型的背景下,把恢复人的集体感,实现人的道德完美和情感需求,视为政治系统的立法目标。

而从时代角度来说,在当代行为主义风行之前,整个传统政治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的应该也是“政治哲学”。大多数传统政治学研究者一般情况下总是把自己的研究看成是整体政治过程的一部分,总是致力于回答“应该是什么”这样的大问题。情况正如艾萨克所说的:“政治思想家虽然往往兼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于一身,但政治哲学家通常很少是出色的科学家,因为科学活动从来不是政治哲学家关心的主要问题。”科班也指出,伟大的政治哲学家的著作都“带有实际的目的,都想影响实际的政治行为。他们借著书立说来谴责或支持现有的制度,为一个政治系统辩护或劝说其公民去改变这个系统……”^①在政治学的这个研究阶段中,人们的研究始终围绕着制度、法律和它们的订立基础展开,主要的注意力总是集中在如法定的机构、宪法、权力、国家形式、主权、自然法、人性等方面。

^① [美] 阿兰·艾萨克:《政治学的视野与方法》,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6 页。

然而斗转星移,随着自然科学在近现代逐步建立和巩固起自己在方法论上的霸权地位,随着科学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方法论向社会科学领域的全面渗透,以行为主义为代表的“科学方法论”逐步在政治学研究中占据了主流地位。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在一些国家中,如美国,直到今天为止),政治学意味着是“政治科学”或至少它的目标是成为“政治科学”。由于政治哲学难以满足这种“科学化”的要求,便不可避免地面临了被清除出“政治科学”的命运。这样一来,大凡政治哲学涉及的内容便不再有权继续留在“政治学”的范围之中,而“如何研究政治学”这一政治学方法范畴中所能保留的只有那些与“政治科学研究”相关的内容,而不能是与“政治哲学研究”相关的内容。这样,政治学方法论所讨论的内容不能不主要集中在技术性、工具性和实证性的方法上。否则的话,政治学研究在行为主义看来就超出了“政治科学”,也即政治学的范围。在政治学研究的这一阶段中,人们的研究方向转向了“经验性”、实证性研究,对利益集团、投票行为和政治社会化等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研究中也比较多地运用起比较方法以及从其他学科借鉴过来的方法。

把政治哲学排除在政治学之外,力图使政治学研究真正做到价值中立、价值祛除和科学化,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愿望,而这种做法在事实上也不是没有建树。行为主义对众多政治现象所作的统计分析、建模、相关分析和量化分析大大丰富了政治学研究方法,拓展出了一片前人很少涉足的绿洲,并在很多领域,特别是微观领域中取得了可喜的突破性进展。所有这些,对于政治学研究的深入全面发展应该说是大有裨益的。

然而,对政治学的实证式研究取得了瞩目的成果是一回事,而对政治学的实证式研究是否能涵盖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全部则是另一回事。人们在努力将政治研究“科学化”的同时,也逐渐发现政治学实证研究的一些局限;因过分的定量化和琐细的分析而无法面对宏观定性分析的要求,无法面对复杂的大系统;无法满足和适合政治学作为人文学科在研究方法上的特殊要求。

更重要的是,政治学实证主义所坚持的来自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已经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领域中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反省和“扬弃”。当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认识论方法上的新突破,主要表现在凸显出了认识主体在整个认识过程中的建构作用,打破了科学主义在认识论方面的纯客观神话。没有观察不渗透着理论,没有描述不需要剪裁,没有比较分析不夹杂着思想,没有发现不隐含着预期,这样的一些认识已为

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于是我们看到,以突出“科学主义”色彩为特点的实证研究方法在当代自然科学中和社会科学中已不再是无可怀疑和不可商榷的了,而原来以为人们能够在研究中做到价值中立的想法,说到底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或者只是一种误解罢了。

由此我们看到,认识论方法上所取得的这一革命性进展,实际上最终宣告了“科学主义”的终结,宣告了政治学研究中实证主义方法论霸权的破产。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不仅不再能垄断人文科学研究、垄断政治学研究,就是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也受到了相当的限制。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政治学研究的范围也很难继续限定在工具性和“科学性”的分析活动内。于是,政治学不能等于政治科学,政治学研究无法排除政治哲学遂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政治学研究范围的确定在经历了这样一个曲折的变化之后,又重新把政治哲学纳入了自己的视野。科学主义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中的退潮,使我们不能不反省行为主义在政治学范围和政治学研究方法方面的偏狭。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如何研究政治学”这个问题的答案也终于变得明朗起来;政治学方法论不能再囿于经验和实证的领域,它必须直面价值范畴,做到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统一。

政治学研究范围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范围和特征。政治学研究范围的确定,也就使我们有可能来进一步讨论与政治学方法论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了。

第二节 政治学方法论一般

一、政治学方法论的总体构成

政治学方法论的内涵很丰富,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作不同的分类。如果我们从其适用范围及理论化程度这个层面来看,政治学方法论大体上可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理论、具体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这里所谓的理论,是指政治学方法中的“元理论”,是关于方法的方法。它在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体系中抽象程度最高,适用范围最广,相对远离实证(经验)范畴而具有浓厚的“哲学”色彩,因而也总是与某种先在的认识框架、与一定的价值判断联系得比较紧密。

一般而言,关于方法的“元理论”在总体上确定具体的政治学研究目

标与指导思想,并构成关于研究方法与研究技术的理论。具体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只能提供实现研究目标的途径,而不能说明研究目标自身。政治学方法中的元理论还侧重于解决政治学研究中的事实与价值、解释与理解、演绎与归纳、科学论断的获得与验证、建构政治理论的方法等一系列方法上的根本问题。政治学方法论的理论一般,还关注对现有的研究方法与技术进行综合评估以确定其运用范围与运用方式,以及新兴研究方法的发展与检验。

政治学的具体研究方法有很多种类,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对各种具体研究方法进行不同的分类。依据“事实、价值”区分这一标准,可以分为规范研究方法 with 经验(实证)研究方法这两种最基本的政治学研究方法;依据政治学方法论在历史上发展的阶段性标准,又可分为传统研究方法、经验(实证)研究方法和当代研究方法这几种。传统研究方法通常包括规范研究方法、历史研究方法、制度研究方法 with 法律研究方法等。经验(实证)研究方法则以行为主义研究方法为典型代表。当代研究方法则站在一个新的高度,力求在综合传统与经验方法各自合理性的基础上,达到一种新的“统一”。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当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以及各学科之间在方法论上的相互渗透,在传统研究方法、经验(实证)研究方法 with 当代研究方法之间,还出现了一些较难归类、介乎它们之间的一些方法,如数学分析方法、博弈论分析方法、经济学分析方法、生物学分析方法、社会学分析方法、人类学分析方法、心理学分析方法、角色分析方法、权力分析方法、精英分析方法、结构功能分析方法、沟通论分析方法、系统论分析方法以及比较分析方法等。这些方法各有自身特点,自成一体,但又博采众长,兼容并蓄,并不完全相互对立和相互排斥。因而在具体的政治学研究中往往被交叉、重叠使用。

政治学的研究技术,是指那些具有高度工具性的、具体的、有关搜集与分析相关政治资料的手段与方法,如调查、问卷与抽样设计、内容分析、统计、量化、模式建立、计算机运用等有关技术。这一层次的方法在整个方法体系中地位最低,它常常涉及如何根据特定的研究课题和特定的研究目标,运用相应的技术手段来获取与分析有关的资料。这个层面上的方法一般来说都要接受经验的检验,也最容易做到“实证化”。至于这一层次研究方法的掌握,则通常都需要接受专门的技术培训和教育才能做到。

除了以上三个层次的基本内容外,在政治学方法论中,近年来还开展

了对所谓“研究设计”的研究,这使得政治学方法论更加趋于务实与完备。“研究设计”主要涉及如何对政治学研究加以规划这样的实际问题,包括如何选择课题,如何对课题进行设计,如何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如何搜集、分析与运用相关资料,如何建立操作性的定义,如何对得出的答案加以检验,以及如何规划研究步骤等。由此可见,“研究设计”通常是根据具体研究工作的需要来合理有效地运用各种研究方法与技术的实施方案。事实上,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合理的研究规划,就难以产生预期的研究成果。

从总体上讲,政治学方法论主要讨论的是认识政治现象和预测政治行为的方法与途径。它系统地讨论有关认识、描述以及获取政治学知识的方式,并提供有关验证这种知识的尺度。与其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支学科的方法论一样,政治学方法论的本质是认识论,是对认识政治世界和在政治领域中求知方式的研究。同时,政治学方法论又是对诸种政治学研究方法与研究技术的研究,对它们进行描述、解释与论证。研究政治学方法论的目的主要在于提高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穿透力、领悟力与可靠性,在于提供合适的研究方法、研究技术与指导思想,帮助政治学研究者从多角度去把握政治现象,并通过对政治现象的描述与释义去开掘政治发展的共性和个性,去拓展政治发展未来和可能的空间。

二、政治学研究方法的选择和运用

政治学研究方法多种多样,各种研究方法各有自己的特点和适用范围。面对研究的目的、性质、对象和任务的不同,就必然会有一个方法的选择问题。正确地选择方法是完成政治学研究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环节。方法的选择一般来说,既要求有科学性,又要求有艺术性。所谓科学性,即要求方法和所研究的对象特点、研究的目的、性质相一致。比如,常用来分析宏观政治现象的方法不宜用来作为分析微观、经验实证性政治现象的工具;反过来,经验实证性的分析工具或方法也不宜用来作为分析涉及世界观、立场、价值层面的政治事务的工具。除此之外,一定的政治学研究还总是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展开的,都会涉及诸如社会及政治文化氛围、意识形态背景、学科发展水平以及已有研究手段等客观因素,所有这些在进行方法选择时便不能不加考虑。不难理解,一定的方法选择是对于诸种因素综合考虑的结果,必须遵循我们通常所讲的客观性原则,在这个问题上应力戒研究者本人的主观随意性和任意性。